

论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

甘强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价值基准属于价值的范畴,我们应当依据主体间性的当代哲学观来认识它。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是指在经济法领域中,贯穿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对各种利益调整时所遵循的评价标准。当下的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存在着“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两种理念的对峙从而难以体系化,应当综合这两种理念建构新的价值基准。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基准;主体间性;功利主义;正义原则;沟通正义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3-0038-07

众所周知,法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命题,那就是法的基本功能是对各种利益的平衡。利益法学的赫克将此归纳为:利益是法的原因,法主要规范着利益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显性特征,如果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程度日益扩大,就会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甚至使社会陷入混乱、倒退。因此,法律如何来调整利益就是一个理论和现实都需要回应的问题。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包括立法环节的利益确认、执法环节的利益实现以及司法环节的利益维护,但无论在哪个环节,法律对利益的调整都需要遵循价值的导引。本文拟探讨的就是经济法调整利益时的价值基准,具体的分析准备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首先探讨什么是价值基准;其次对当下经济法的价值基准进行归纳,并指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讨论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应当是什么,即建构一种新的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

一、价值基准的基本认知

(一)“主体间性”哲学思想的价值观

从学理上讲,价值基准属于价值的范畴,一般认为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体现了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2]这种认识源于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论述。马克思

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他们需要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物的属性”。^[4]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论述精辟而深刻,它准确地揭示出了价值是相对于人这一主体而言的关系范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下的认识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是近代主客二元分立的哲学思想。按照这种哲学思想,只能以“自我”为主体,“自我”以外的一切,不管是物还是人都成为客体,这些客体只是“自我”这个主体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所以价值也只能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但如果我们遵循马克思思考的路径,并参照当代哲学主体间性的思想,就会发现价值不仅是客体对主体的有效性,它还包括主体之间的有效性。因为相对于“自我”这个主体之外,既包括所谓客体的物,也包括作为同等地位的他人,即另一个主体,所以与“自我”这个主体发生关系的就不只是客体,也包括了另一个主体,这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可以说,主体间性既包括了人与物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我与他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充分融合。这种新的哲学思想打破了近代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互为目的”和“互为手段”,而不是纯粹的以自我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因此主体之间的彼此沟通协调就显得特别重要。毋庸置疑,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为我们认识价值开放出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即价值不仅是所谓客体对主体的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强化主体之间彼此相互沟通达成理解,因为这种理解可以满足双方的需要,因而也具有了价值维度。这就为建构经济法

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思维。

（二）价值基准的界定

我们已经知道，从一般意义上讲，价值是一个主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范畴，但在每个特定的领域中还是有其个性。因而我们对价值基准的界定也应当是在法的价值这一特定领域里进行。

根据沈宗灵教授的归纳，法的价值应当蕴含三层涵义：一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二是指法律本身有哪些价值，三是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价值评价。

^[5]所以法的价值至少包含以下几个范畴，即法的价值目标、法的价值内容和法的价值标准。所谓法的价值目标，是指法对价值的追求和企盼，这种追求和企盼表现为一种广泛认同的预期，它对于法律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公认的法的价值目标有很多，包括正义、公平、秩序和效率等等，例如陈云良教授就认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自由、公平、效率和安全。

^[6]通常我们在使用法的价值这一范畴时，其实就是在表达法的目标这一含义。所谓法的价值内容，是指法满足主体的需要的具体内容，例如法律禁止不正当竞争，因而能满足市场经济主体对公平交易的需要，所以“公平竞争”就是法律对于市场主体的一种具体价值。而所谓法的价值标准，是指特定主体借以评价法律现象和法律价值状态的具体标准，这种标准既可以为人所公认的基本观念，例如公平、自由和秩序等等，也可表现为一种合意，即主体之间沟通协调之后所达成的理解。当然，上述三个范畴的区别有时并不那么明显，某些元素可以同时满足上述三个范畴的要求。例如公平，它既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目标，也可以作为法律价值内容，还可以作为法律价值尺度。然而，作出这样的界分还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如社会利益，它可以作为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因为它表明的是经济法应当追求社会利益这一目标，但并不表示经济法就不追求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或者说社会利益一定就优先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7]当然，社会利益也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的内容，因为经济法显然可以给主体带来社会利益，因而可以满足主体对社会利益的需要。但如果我们将社会利益上升到价值尺度就会存在困难，因为那样意味着当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或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然优先考虑社会利益。因此，这样的选择就很难说具有合理性。而且，如果我们采用社会利益作为价值标准，就还会遭遇到另一个困境，那就是当一种社会利益与另一种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该以什么为标准来予以评判？所以，我们可

以把社会利益作为法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内容，却不能简单地将其抽象为一种价值标准。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价值基准作出基本的界定了，所谓价值基准就是指法的价值的第三个含义——法的价值标准，它是特定主体对各种法律事项所作评价的标准。

二、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

正如上述，价值基准是一种法的价值标准，因此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就是指在经济法领域中，贯穿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对各种利益调整时所遵循的评价标准。虽然对于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少有学者系统地展开研究，但在各种经济法价值研究中都有所涉猎，因此探析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可以为建构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提供理论准备。

（一）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梳理

一般来讲，经济法学界是从三个视角来认知经济法价值，一是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二是从经济民主、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角度，三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8]因此，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基准，学界比较公认的有社会利益、社会公平、经济效益、经济自由、经济秩序和经济民主等。对于社会公平、经济秩序和经济效益，学界的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社会公平是维护弱者的实质公平；经济秩序是指维护社会整体效益；经济秩序则是指维护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然而，对于其余三个价值基准，却有不同的观点。具体而言：对于社会利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是指作为有机体的社会所具有的利益，截然独立于个人和国家利益，这是狭义社会本位论的观点；另一种认为是指各种利益的综合，不是指所谓的社会实体的利益，这是广义社会本位论的观点。^[7]对于经济自由，一种观点强化对个体自由的保护，它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不受以普遍利益为借口的干预，^[9]这是消极自由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是积极自由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法的语境中，国家干预是经济自由的内在需要，干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自由进行某些限制，但限制只是手段，维护整个市场竞争自由才是目的”。^[10]对于经济民主，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视角。一是从平等的角度，例如日本学者金泽良雄就认为，经济民主“是谋求在构成市场的事業者之间实现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11]二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有学者就认为“经

济民主是作为经济专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12]

(二) 当下价值基准的结构

事实上,上述价值基准存在着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的二元结构。所谓功利主义是指由休谟、斯密、边沁、穆勒、西季维克和摩尔这些哲学大师所传递的伦理学传统,其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而正义原则主要是指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或者简称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的目标就是要取代在现代伦理学中一直占有优势的功利主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功利与正义的交锋。“作为公平的正义”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scheme)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13](70)}如果我们参照上述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实际上都是遵循功利和正义这两种思维而建构的。

我们首先分析属于功利主义价值的,这在现有的价值基准中比较多。比如社会利益价值基准,广义社会本位论强调要协调各种利益,从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属于典型的功利主义价值。除此之外,经济效益也是比较典型的功利主义价值,它强调只有符合社会整体效益的效益才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价值,实际上也是以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来进行判断的。与之相似的则是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秩序,而不是个体的利益,因而为了整体经济秩序而限制个体利益是合理的。而经济自由价值,如果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认识,那么它为了整体自由而可以限制某些个体的利益,因而是否自由乃是以大多数的自由为标准的,其实质也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判断标准,所以也是一种功利主义价值。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相似,如果将经济民主解释为公众参与,它实际上也是讲每个人的参与本身就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家参与讨论的结果也一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民主也是一种功利主义价值。

然而,现有价值基准中也有属于正义原则价值的,最为典型的的就是社会公平。这种价值是一种实质公平,它特别关注弱者的利益,所以判定是否公平,不是以大多数人是否享有公平作为标准,而是看少数最弱者

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由此可见,社会公平是一种正义原则价值。当然,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价值,也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正义原则价值。这是因为,它依据消极自由的理念,强调每个个体的利益不容以大多数人利益的名义加以侵害。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种与功利原则针锋相对的价值。除此之外,以平等来解释的经济民主,也是比较典型的正义原则价值。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弱者能否获得与强者同等的地位,而不是说只要大多数人享有了地位即可。我们可以通过表 1 来说明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结构。

表 1 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

功利主义价值	正义原则价值
社会利益(大多数人利益)	社会公平
经济自由(积极自由)	经济自由(消极自由)
经济民主(公众参与)	经济民主(平等)
经济效益	
经济秩序	

(三) 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困境

根据上述,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是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的框架,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前者属于“目的论”伦理学,后者属于“义务论”伦理学,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义务论”伦理学强调“正当”是优先于“好”的,而“目的论”伦理学则刚好相反,^{[14](68)}二者形成了激烈的交锋。

正义原则对功利主义的质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功利主义只关注是否最大多数人得到了最大的利益,但如何分配则不在考虑之列,因而可能导致不正义。正如罗尔斯所分析的: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说,社会必须分配它满足的手段——无论权利、义务,还是机会、特权、或者各种形式的财富,以便达到可能产生的最大值,但是没有任何分配形式本身会比另一种形式更好。^[15]其二,功利主义可能允许以大多数人利益的名义,去侵犯少数人的自由权利。例如功利主义可能从个人原则出发,认为既然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利益,以获得他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么社会也可能以牺牲少数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得更多数人利益的满足。例如一个镇长知道将发生一个暴动而且数百人被杀死,如果镇长诬陷一个无辜的人可以避免暴动的发生,则似乎镇长应该这么做。^[16]

面对正义原则的批评,功利主义自然不会轻易承

认，他们宣称功利主义是尊重个体权利的一种理论，而且功利主义要求每个人都以同情他人的道德观念去看待他人，以此来杜绝不公平的发生。当然，功利主义上述两个缺陷不能由于这样的辩护而被遮盖，但我们也不能就基于此而否认功利主义的积极意义，转而认为正义原则完美无缺。事实上，作为义务论的正义原则也并非没有缺陷，虽然正义原则对道德进行了弘扬，它强调正义的崇高性、绝对性和不可妥协性，但它却可能忽视人的需要，极端的正义论甚至可能割裂道德与生活的联系，使正义成为枯燥和空洞的教条。所以某些正义原则所宣称的绝对不可妥协的权利，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也可能基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加以限制，例如在近代社会，财产权利曾被视为自由权而绝对不允许受到国家干涉，然而在现代社会，国家基于社会公共福利的需要对其限制则被认为是合宪的，因而具有正当性。^[17]

由此可见，极端的功利主义思想和正义原则都不能成为我们建构价值基准的理论基础，比较妥当的方式是在功利与正义之间进行探寻，这就为我们建构新的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提供了理论资源。

三、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的构建

我们拟构建的价值基准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基本自由与权利具有优先性。第二，在保障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前提下，遵循利益交换的原则，即通过充分对话沟通来达成合意。最后，如果沟通不能达成一致，就采用综合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来调整利益，但必须对利益受损者给与补偿。上述三个层次分别形成一个独立的价值基准，而三个价值基准又以序列的形式共同构成了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体系，只有在前面的价值基准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下一个价值基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字典式的价值基准序列。

（一）基本自由与权利是干预的边界

这一价值基准的含义是指当经济法调整利益时，应当首先保护的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个人基本自由和权利不能基于多数人利益的需要而被干预，它处于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的第一层次，是价值基准中应当首先满足的原则，我们称之为第一价值基准。

从学理上讲，第一价值基准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正如前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有两个，第一是机会均等原则，第二是差异原则。一般来讲，经济法学者往往重视差

异化原则，因为差异原则为国家干预提供了合法性。毫无疑问，这样的认识是准确的，但也是不全面的。因为这样的思路放大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第二个原则，但却忽视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整体性，因而也遮蔽了罗尔斯第一个原则的重要性，即对基本权利和自由保护的正义性要求。如果经济法只注重差异原则，就容易导致国家干预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害，也可能忽略国家对各种利益的分配的限度。而罗尔斯恰恰特别强调其正义原则的一体性，并指出两个原则存在着一种字典式秩序(lexical order)，即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这一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的违反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辩护或补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及权力的等级制，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14](62)}也就是说，排除了由第一个原则所涵盖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与由差异原则所调节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相互交换的可能。所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首先强调是基本的自由和权利是不容干预的。

那么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罗尔斯认为是由法律所保障的具体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存在于各种权利法案和人权宣言中的具体的权利和自由。^{[13](72)}通过法律这一媒介，他使基本自由和权利从政治哲学领域进入到了宪政的领域，从而使基本自由和权利自然过渡为一种宪法权利，也就是基本人权。事实上，在经济法学界，已有部分学者高度重视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例如，徐孟洲教授就认为，以人为本属于经济法具有的内在价值，它是经济法理念的核心，这就要求经济法尊重人权、实行经济民主和管理手段的人文化。^[18]还有学者认为：保护基本人权应当是经济法的宗旨，虽然保障人权的目标并非经济法所独有的目标，但由于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个体和整体都很重要，因而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保障人权的目标在经济法各个部门法上都有体现，例如财政法通过预算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来保障人权；税法通过税收优惠制度、基本生活资料不课税等来保障人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各类竞争法通过对消费者的保护来保障基本人权。^[19]这充分说明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优先性。

进一步分析，罗尔斯认为基本自由和权利包括：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自由(例如政治活动中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结社自由以及由人的自由和健全(物理的和心理的)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最后，由法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由。^{[13](72)}从这份清单中我们不难梳理出有政治权利、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但没有经济自由。这并非罗尔斯的疏忽，相反从这一点可以看

出罗尔斯对经济自由的认识是深刻的。因为当代的经济自由已经不可能绝对杜绝国家的干预。众所周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的经济自由必定产生垄断,而垄断反过来又必定影响自由本身,所以国家介入经济来干预传统的财产权和营业自由已成必然,经济自由也已经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转变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自由,它并非绝对不可干预,所以罗尔斯认为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是合乎正义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所指的第一价值基准主要包括人身权利、精神自由和政治权利。

(二) 沟通正义是干预的前提

哈贝马斯说:“法律体现着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而只有相关的人们自己才知道需要和利益是什么,因此,涉及某些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法律,首先必须由他们自己讨论和协商。”^[20]所以,除了不能妥协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之外,让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充分的对话交流,彼此妥协,最后达成一个大家均能接受的利益状态,既符合大家的利益需求,也符合正义的要求,这就是利益协商的思想。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沟通正义,这就是第二价值基准。

沟通能否达成,是这一价值基准成立的前提。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在进行社会活动时都是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但如果完全只考虑自己利益则不可能形成合作,反而会减小自己的利益,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出于理性的考虑,人们会对利益进行妥协,从而使利益协商得以达成,这是一种目的理性的表现。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也许更具有解释力,所谓的沟通理性就是人与人在交往当中表现出来的理性。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当一群人通过理性的商谈和讨论去互相理解、协调行动、解决问题或处理冲突时,这便是沟通理性的体现。反过来讲,如果人类诉诸暴力以致战争来解决问题,这便是沟通理性的反面。由此可见,当人们用和平的、理性的语言沟通来进行交往时,他们便是在使用 and 发挥其沟通理性。”^[21]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整合了康德所界分的三大理性,即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伦理理性。正是由于利益主体具有沟通理性,人们才可以就利益进行协商并形成共识,这种理性比目的理性更强调对彼此的尊重,因而也更容易达成利益协调。

而沟通正义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价值标准,则是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一项法律只有当每个人都认为它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时候,才具有道德有效性。由于‘普遍’法律满足了根据所有人的利益来调节物质的条件,因此,实践理性也就体现为把法律关注的利益普遍化的能力。所以,一旦一个人像民主的立法者

和自己商量,普遍遵守假定规范而导致的实践是否会被共同立法者所接受,那么,他也就具有了道德视角。”^[22](33-34)]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通过沟通协商后获得的利益妥协具有道德的维度,因为人们在交往沟通之中,必须以道德的视角来达到利益的妥协,因而就具有了价值的高度。对此,哈贝马斯总结道:“商谈过程动用了实用理由和伦理理由,而且这些理由还保持着与利益格局以及每个人的自我理解之间的内在联系”^[22](34)]。因而每个个体利益者通过协商对话而导致了一种沟通的正义,而这种沟通正义自然也可以作为法律的一种价值基准。在经济法中,沟通正义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它们都为经济法主体进行利益沟通提供了价值标准。

(三) 利益综合最大化是干预的目标

根据我们的研究,基本自由和权利不容干预,而且在干预之前还应当尊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商,但协商并非总能达成一致,这就需要干预来达到利益综合最大化,这就是第三个价值基准——利益综合最大化,这显然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价值。

所谓利益综合最大化是指在调整利益时应当以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为判断标准,如果总量增进则符合利益综合最大化的标准,如果总量减少则不符合。庞德正是以这样的思维来确定法律的任务,他指出“我们以为正义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德行,它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我们以为它意味着一种制度。我们以为它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 and 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质和满足人类享有某些东西 and 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 and 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以满足。”^[23]虽然当下经济法的价值基准没有明确提出利益综合最大化的概念,然而正如前述,许多价值基准都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例如社会利益(广义社会本位论)、经济自由(积极自由)、经济民主(公众参与)、经济效益、经济秩序等等,这些表述从某个方面都表达出了利益综合最大化的思想。但我们不准备根据现有价值基准来进行阐述,而是提出两个具体的标准,即“最大利益净余额”和“不损害一人的增加利益总量”,这两个标准可以包容上述各种价值基准。

所谓“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是指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增加整个社会利益总量为原则。之所以要确定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当人们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要增进一些人的利益,就必然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所以增进每个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增进社会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按照这样的标准,就只能为了多数人的较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较小利益。因为增

进多数人的利益而减少少数人利益，其净余额就是增加了利益总量，这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原则。但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当我们依据这样的标准减少少数人利益之时，应当对减少的人予以补偿。强调这一点对经济法在调整利益冲突时尤为重要，因为当下的经济法往往只强调维护社会利益，而对于个人利益的补偿却关注不够，这就容易导致以利益综合最大化的名义侵犯个人利益，因而必须强调对少数人的补偿。

而所谓“不损害一人的增加总量”，是指在不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不损害一个人利益而增加利益总量，这个原则实际是“帕累托改进”的体现。帕累托最优原本是经济学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在生产 and 消费两方面都有效率的情况。在生产领域，当使用现有的资源不可能生产更多的商品或者说产出对于既定的投入达到最大时，即表明生产是有效率的；在消费领域，当不使其他一些消费者境况更坏，在消费者之间交换或重新分配商品或劳务就不能使任何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好时，即表明商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是有效率的。^[24]所以当社会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改革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好时，我们就称之为帕累托状态。所以，“不损害一人的增加总量”，实际上就是帕累托改进原理的体现。对于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的经济法，在许多时候都应当遵循这个价值基准，因为外部性的克服、公共产品的供给、信息的提供都可能是在不损及一人的情况下而使利益综合最大化。

注释：

需要说明的是有许多关于经济法价值的研究并没有对价值目标、价值内容和价值标准做出区分，因此本文在梳理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时主要依据各位学者对价值的整体性描述而展开，当然其所描述的价值一定要蕴涵标准的意味。此外，由于几乎没有人对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进行特别论述，所以本文的整理针对的是经济法的价值基准。有鉴于法律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平衡，因而经济法的价值基准在某种意义上与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是高度重合的，所以探讨经济法的价值基准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德认为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各有其特殊性和固有的规律，因此在这些知识和行为领域中，就必须遵循不同的理性原则。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活动中，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在社会领域，人们必须服从实践理性原则；而在主观意识即思维领域，审美——伦理理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康德对这三种理性的论述，分别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作出了详细的阐释。参见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本文所提出的两个标准借鉴了王海明教授的关于“道德终极标准”，但笔者并不赞同王教授将功利主义原则作为“道德终极标准”。参见王海明：《新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15-162页。

参考文献：

- [1] 张文显.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9.
- [2] 李德顺. 价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39.
- [5] 沈宗灵.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6.
- [6] 陈云良. 中国经济法的国际化路径[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84-112.
- [7] 甘强. 经济法利益理论研究的思考[C]//漆多俊. 经济法论丛2009年上卷.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 [8] 肖江平. 中国经济法史研究[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219-224.
- [9] 吴越. 经济宪法学导论——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4.
- [10] 李昌麒. 需要干预说与中国经济法[J]. 社会科学家，2007，(2)：5.
- [11] [日]金泽良雄. 经济法概论[M]. 满达人译. 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180.
- [12] 李昌麒. 鲁篱. 中国经济法现代化若干思考[J]. 法学研究，1999，(3)：95.
- [13] [美]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 姚大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70.
- [14] 何怀宏. 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 正义论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68.
- [15] [美]罗尔斯著.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6] Howard Davies, David Holdcroft. *Jurisprudence* [M] London: London Dublin Edinburgh, 1991: 219.
- [17] 林来梵. 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0.
- [18] 徐孟洲. 论中国经济法制与和谐社会之构建[J]. 法学杂志，2005，(6)：45.
- [19] 张守文.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19.
- [20] 高鸿钧. 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述[C]//高鸿钧. 马剑银. 社会理论之法：解读与评析.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34.
- [21] 陈弘毅. 从哈贝马斯的哲学看现代性与现代法治[C]//高洪钧. 马剑银. 社会理论之法：解读与评析.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92-293.
- [22] [德]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3] [美]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 沈宗灵. 董世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5.
- [24] [美]罗伯特·考特. 托马斯·尤伦. 法和经济学[M]. 张军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58.

On value criteria for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of economic law

GAN Qiang

(School of Economic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Value Criteria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value, which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Value criteria for protection of interest of economic law is considered as evaluation criteria, 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strictly by economic law in stages of acknowledgement by legislation, guaranteed by law enforcement and maintained by judicature of interests. As there exists in value criteria for protection of interest of economic law a confrontation of principles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justice”, a system of value criteria is so difficult to be constructed that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should entail a break-through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justice”.

Key Words: economic law; value criteria; intersubjectivity; utilitarianism; justice; justice in communication

[编辑：苏慧]

(上接 18 页)

The significance of nothingness and clear-awareness in Wang Longxi's study of conscience

DAI Ch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Nothingness and clear-awareness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having close conne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Wang Longxi. The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both in the definition of ethical value and in the practice of moral cultivation. Many scholars, however, criticized that his philosophy was actually from Zen Buddhism because of the two concept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two concepts in depth so as to reveal their profound meaning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in Wang Longxi's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in moral ontology and moral practice. Therefore, the meanings of the two concepts in Wang Longxi's philosophy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Zen Buddhism. Wang Long's philosophy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Zen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two concepts.

Key Words: Wang Longxi; Wang Yangmin; nothingness; clear-awareness; conscience; quietness

[编辑：颜关明]